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及新型文明观的塑造*

罗红杰

【内容提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在现代化实践中实现着自身“术语的革命”。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不仅是文明话语的更新，更是文明内涵的重塑，深化了对中华文明的规律性认识。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内蕴一系列标识性文明概念和话语，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全球文明倡议等文明话语是中华文明生命更新的话语表征。“术语的革命”彰显中华文明话语实践的现代意义，具有“根脉”与“魂脉”相结合的鲜明意蕴。中华文明在实现“术语的革命”的同时塑造着一种新型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主张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对破解人类文明发展困境、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华文明 “术语的革命” 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的文化生命体 新型文明观

作者简介：罗红杰（1991-），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092）。

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①“术语的革命”涉及话语更新及其现代意义的确证，是对术语背后实践的规律性认识的深化。它不是空洞的语言游戏，而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交往活动变革的产物^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过去走到现在，生命力依然旺盛；同时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在现代化实践中实现话语创新和生命更新，即恩格斯所说的“术语的革命”。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一方面指向中华文明话语实践的革新及其现代意义的确证，另一方面指向中华文明内涵的拓展和规律性认识的深化。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呈现出新的话语标识和实践内涵。为此，有必要从“术语的革命”视角阐明中华文明更新过程中内蕴的一系列标识性文明概念和话语，同时着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形塑引领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型文明观。

一、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何以必要和可能

“术语的革命”本质上是实践的革命。中华文明在“我们的时代”实现“术语的革命”，指向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在话语上呈现出一系列标识性新概念的串联。正确判断话语演变，既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现实，也需要把握历史发展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正是在把握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视听叙事体系建构研究”（23CKS057）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② 参见刘同舫：《“术语的革命”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光明日报》2025年1月13日。

“历史”“现实”和“未来”基础上的话语生成和意义确证。

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的出场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一是顺应历史趋势和时代大势。“文明是实践的事情”^①，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是在生产方式变革基础上的话语创新和文明新生。一方面，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话语标识。另一方面，民族复兴内蕴着文明新生，指向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人类文明格局的重建，也呼唤能够引领文明交流互鉴的话语创新和新型文明观。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是顺应历史趋势和时代大势的合理存在。二是合规律性的转型。“术语的革命”是源于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在话语表达上实现的“革命”。文明话语的革新要遵循文明实践推动文明话语“新陈代谢”的一般规律。现代化是文明新生和话语创新的催生力量，有什么样的现代化，就有什么样的话语标识和文明样态。西方现代化割裂了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并伴随着对他国的意识形态输出和精神殖民。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更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表征着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话语标识和文明样态。三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从中华文明演进的视角看，一定时期中华文明话语的实践内涵是在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过往的传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并积淀了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实现的文明话语更新。四是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方案。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内蕴的文明话语是在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基础上提炼的标识性话语。提炼中华文明标识性话语是破除资本主义文明霸权的迫切需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现代化的先发优势把持着文明的定义权和主导权，他们认为“现代化=西方化”“现代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不断强化“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并宣称“文明”拥有宰制世界的权利，“野蛮”只能被奴役和剥削。为此，要揭露资本主义文明的话语陷阱，提炼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文明话语，实现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构建以中华文明为基点、以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观照的现代文明话语体系。

在明晰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何以必要的基础上，要进一步追问其何以可能的问题。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为中华文明的话语更新提供动力源泉。文明及其话语更新是一定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和认识升华，正如马克思把在实践基础上“获得一定的生产力”比喻成“文明的果实”^②，恩格斯讲“文明是实践的事情”^③。在现代化实践中，中华文明实现着自身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国式现代化促使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生变革，文明的“术语”也需要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④，甚至直接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⑤。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标识性话语，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就是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双向赋予的过程中实现的话语更新。其次，“两个结合”为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提供方法论指导。“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也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⑥。其中，“第二个结合”不是对“第一个结合”的否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④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0页。

⑤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页。

⑥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页。

也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重现，而是历史辩证法的科学运用。正如毛泽东所讲，尊重历史“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①。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法，助推“根脉”与“魂脉”的双向贯通，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在文明及其话语上实现更新。最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塑造文明话语新标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本质在于中华民族文化自我的回归，核心在于中华民族思想自我的彰显。“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②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呈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既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塑造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实现“术语的革命”的历史。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陷入生存危机，与此同时民族文化危机也悄然而至。“文明蒙尘”意味着文化主体性的消解，实现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也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应然诉求。然而，“古今中西”的方案并未实质性地改变中华文明的发展走向：一是向内求解陷入了文化复古主义的泥沼，传统文化的封建主义属性未能被剥离出去；二是向外求索遭遇“全盘西化”的风险，资本主义的文化方案无法重振中华文明的荣光。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确立，我们找到了一条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正确文化发展之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得以重塑。在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种文化生命体既包括文明话语实践的革新，也关涉文明意义的现代确证。

二、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内蕴的标识性概念

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内蕴一系列标识性文明概念，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全球文明倡议等文明概念是中华文明生命更新的话语表征。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是一种文明的打开方式^③。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的话语标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④文明的发展演变与特定的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关。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展开，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也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逐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文明形态是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果实”。从“文明蒙尘”到“文明新生”的历史进程与我国的现代化实践同步推进。“文明蒙尘”源自西方现代化的展开，西方国家凭借“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走自己的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在现代化实践中促使中华文明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现代”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规定，而是将文明的创造根基从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化为现代化物质大生产的逻辑，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框架中推动文明创新发展^⑤。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是双向赋予、双向互动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养分，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获取现代力量和实现生命更新。中华文明从历史中走来，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实现生命更新，呈现出新的文明话语标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

② 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页。

③ 参见项久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⑤ 参见张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超越性的三重维度——兼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意义》，《人文杂志》2024年第3期。

其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民族复兴意味着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蕴含鲜明的文明意义，是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的文明话语标识。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随着世界历史实践的普遍展开，中华民族陷入文明蒙尘的境地。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发出东方文明“今犹能卷土重来，以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乎”^①的“中华文明之问”。民族复兴与文明新生是一体推进的过程。民族复兴贯穿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百余年斗争实践的全过程，其总体状态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上，而且体现在精神文明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地要求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相应地，实现民族复兴必然要求实现中华文明生命更新为之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愈接近实现民族复兴，愈需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思想自我”，愈需要坚定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作为文明话语标识的民族复兴不是“海市蜃楼”式的景观描述，而是基于“现实的人”和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话语实践，一方面能够切实呈现与实现民族复兴相适应的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活的状态，另一方面能够凝聚社会共识、汇聚民众力量，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精神支撑。

其三，新的文化生命体。新的文化生命体蕴含鲜明的文明意涵，是“第二个结合”的文明“果实”。新的文化生命体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的新型文化样态，也是对中华文明生命更新的文化诠释。中华文明的话语创新和生命更新不仅需要实践力量的推进，还需要科学思想的引领。“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③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便以“普照的光”为中华文明扫去“蒙尘”，以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中华文明发展进步。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现实转换的难题。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结合”解决了真理的适用性问题，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华文明的走向。“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④“现实”不仅仅指向物质现实，还指向文化现实。“第二个结合”更加重视具体的“中国文化现实”，更加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互动，创造出一种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⑤，这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动话语实践。

其四，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最鲜明的话语标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型话语，确证着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它的提出是一次伟大的“术语革命”^⑥。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的民族叙事逻辑和“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的世界叙事逻辑，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创造的标识性文明概念，既是“四个自信”的话语表达，也是为破解人类文明发展困境提供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叙事，重在突出民族性，那么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一种普遍的文明叙事，重在突出世界性。两种文明叙事的参照系是不同的：中华文明的叙事更多参照中华文明生命更新的演变逻辑，凸显“中国特色”；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叙事更多参照世界文明

① 《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2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3页。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⑤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页。

⑥ 参见刘勇、邱雨：《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多维阐释》，《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8期。

多元发展的逻辑，切合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丰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园。“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①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中华民族作为民族”的现代文明，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社会”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

其五，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情怀，也是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新的话语标识。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外显的公共产品，也是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②，其基点在于文明共存，核心在于文明交流，目的在于文明互鉴。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既保有中华民族的文明特色，也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文明倡议着力回答“世界现代化之问”，是切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智慧和方案。相比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转变成世界历史的实践中主导构建了人类文明秩序，竭力倡导“西方文明优越论”，体现出典型的西方霸权思维和话语风格。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不仅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话语霸权，还要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回应“世界现代化之问”，为化解人类共同难题提供新的文明方案。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四个共同倡导”，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能够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文明话语。

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内蕴的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既具有各自的规定性，又在整体上呈现出一定的体系化特征。文明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实践相联系，是对一定阶段的人类社会实践的概括和总结^③，文明的发展及其“术语的革命”与现代化实践密切相连。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并实现“术语的革命”。作为文明话语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核心主线。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条核心主线，同时观照民族和世界的双重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和全球文明倡议等标识性概念在整体上形成了体系化的话语结构。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民族叙事和世界叙事的统一。就民族叙事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走自己的路探索出来的科学道路。中华文明从历史深处走来，以“第二个结合”开启新的思想解放，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创造出“魂脉”和“根脉”有机结合的文化生命体。就世界叙事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胸怀天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面对“现代化之问”给出全球文明倡议这一中国答案。全球文明倡议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创造的狭隘文明。总而言之，作为文明话语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和全球文明倡议正在构建起一种与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相适应的话语体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7页。

② 参见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页。

③ 参见刘卓红、李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发展的互构逻辑——以文明性为视角》，《探索》2025年第1期。

三、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的本质规定及其学理化阐释

明晰了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内蕴的标识性概念及其体系化特征，还需要进一步阐明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的本质规定，从学理上挖掘中华文明话语创新和生命更新的深层次内涵。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内蕴两个层面的规定性：一是关于文明及文明观的一般规定性，二是中华文明话语创新和生命更新的具体规定性。为此，本文尝试回到马克思，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一般规定性；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依循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两条线索阐释中华文明的话语创新和生命更新。

首先，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一般规定性。“回到马克思”不是教条主义的理论阐释，而是从“魂脉”上澄明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一般规定性，回应“文明及文明观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何以可能”的问题。文明“术语的革命”根本上是关于文明的事情，是关于实践的事情，只有从文明及文明观的一般规定性出发才能深层次理解文明及其“术语”的演变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是关于文明本质、文明动力、文明结构、文明形态以及文明发展路径的总体性看法，我们可以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进行阐释。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明问题的共时性认识。共时性认识指向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问题的规律性认识和本质判断。恩格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①。这不仅确证了文明的动力来源于实践，而且揭示了文明的社会属性。马克思进一步把“文明的一切进步”等同于“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②，肯定了生产力之于文明的价值。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点具体体现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上。新时代，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及其话语创新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也印证了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历史唯物主义性质。文明是野蛮的对立面，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现实社会”历史事实的判断，而非价值层面的文明标准。马克思肯定了“资本的文明面”，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文明”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以生产方式为标准，划分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文明的野蛮性和“阴暗面”。资本主义文明既是优于封建文明的文明样态和话语标识，同时也孕育着埋葬自身力量和创造新文明类型的可能。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明发展趋势、文明发展路径的历时性判断。随着生产方式的革新和社会形态的变革，文明形态和话语标识也不断演变。“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③，基于不同社会形态形成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无法容纳不断扩大的生产力，文明溃败蕴藏在资本的无限膨胀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言，“大工业已经把潜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发展为如此明显的对立，以致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说是用手就可以触摸到了”^④。马克思进一步指明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趋势和可能路径，即实现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并明确了“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⑤的实现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创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

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克服西方现代化发展困境并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局限性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这契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对迈向更高文明形态的可能路径的分析。

其次，深入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阐发中华文明话语创新和生命更新的历时性展开。“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意在强调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是基于中国具体实际和历史传统的文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塑着立足中国、观照世界的文明话语体系。“中国有中国独自的历史现实和历史展开”^①，只有立足中国，才能理解中华文明的话语创新和生命更新。具体而言，可沿着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两条线索进行阐明。一是依循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实践，阐释“文明蒙尘”到“文明新生”的生命更新。如前所述，“文明蒙尘”根源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主义的腐朽，而“文明新生”的实践进程既包括推翻“两座大山”的社会历史实践，也包括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社会历史实践。完成民族复兴历史任务的同时也实现着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及其“术语的革命”。伴随民族复兴和文明新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出场发挥了关键作用，引领和推动着文明新生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及时纠正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找到了一条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有效路径，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某种简单而成的结果，或一经达到就被凝固起来的東西^②，而是需要切中中国现实问题，并引领文明进步。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坚持“走自己的路”，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化一般规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当下最大的政治，而且是生动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华文明将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逐渐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术语的革命”。二是依循中国特定的文化传统，阐释中华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华文明的话语创新和生命更新不是抽象的，而是基于传统文化的发展演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没有“传统”就不会有“现代”，中华文明是基于历史传统的文明样态。对于传统，我们要摆脱两种错误认知：一种是机械地认为“传统”就是腐朽的、消极的、错误的存在，把现代与传统完全对立起来；一种是抽象地认为传统就是过去的存在，是基于过往实践的对象物，和现代距离遥远^③。这两种错误认知会使我们陷入文化虚无主义或者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传统是在历史延续中的“传统”，是活在当下的传统，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来激活传统的现代力量，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这构成了中华文明生命更新的“传统—现代”辩证法，其核心指向新的文化生命体。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文明话语标识，意味着中华文明能够通过自我调适、自我更新保持生机活力。

除了从学理上挖掘中华文明话语创新和生命更新的深层次内涵，还需要在“术语的革命”基础上着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中华文明在“我们的时代”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迫切需要我们立足中华文明生命更新的生动实践总结中国经验，并将其上升为中国理论，进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最大实践”和“最大政治”的中国式现代化，促使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术语的革命”，构建与之相匹配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要摆脱传统知识体系的桎梏，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与之相应的知识体系应克服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时的“失声”“失语”困境，在实现“术语的革命”的同时更加鲜明地展现术语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术语的革命”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要在标识性概念和话语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

① [日]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11页。

② 参见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③ 参见吴晓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使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11期。

知识体系，并着力凸显其“自主性”和“主体性”。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注重汇通古今、融通中外，着力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知识困境，“破”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立”中华文明的自主性，促使知识性更系统、自主性更凸显。

结 语

中华文明“术语的革命”不仅仅表征为文明话语的创新、新型文明形态的生成，同时蕴含着一种新型文明观的出场。文明昭示着人类的进步状态，“文明发展的不同程度集中表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水平和其在社会形态发展序列中的位置”^①，文明观是指对文明基本问题的总体性看法。在“两个大局”下，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文明实现话语创新和生命更新，同时着力克服人类文明发展困境，在此过程中塑造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型文明观。这种新的文明观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②，深化了对中华文明如何赓续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这种新型文明观的“新”是相对于中华文明“传统”的“新”，通过“第二个结合”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同时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基于新时代新征程新实践的“新”，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在“两个大局”中对人类文明格局的重塑，为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③；是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走自己的路”并积极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形塑着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总之，这种新型文明观倡导文明交流互鉴，是“主张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④；坚持人类文明“美美与共”“和合共生”，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的文明观。这种新型文明观具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的鲜明品格，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具有示范效应，对人类文明多元发展具有引领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 [3]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
- [4] 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 [5] 王伟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哲学研究》2025年第1期。
- [6] 刘同舫：《“术语的革命”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光明日报》2025年1月13日。
- [7] 张波：《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关系论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1期。
- [8] 陈曙光：《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建》，《哲学研究》2022年第3期。

（编辑：刘曙辉）

① 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4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8页。

③ 参见任洁：《“两个大局”视野中的新型文明观》，《泰山学刊》2024年第2期。

④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7页。